

The Dressmaker
of Khair Khana

喀布尔女孩

[美] 盖尔·雷蒙◎著 何雨珈◎译

他们不过是没有父母照看，
想要在战争中共同多活一年的孩子。
现在能保护他们的，只有信念，
和那扇把房子和外面世界隔开的绿色大门。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The Dressmaker of Khair Khana

[美] 盖尔·雷蒙◎著 何雨珈◎译

喀布尔女孩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喀布尔女孩 / (美) 雷蒙 (Lemmon, T.) 著; 何雨珈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8

书名原文: The Dressmaker of Khair Khana

ISBN 978-7-5404-5017-5

I. ①喀… II. ①雷…②何…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2191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8-2011-164

上架建议: 外国流行小说

The Dressmaker of Khair Khana © 2011 by Gayle Lemmo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Yael Tzemach c/o

In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LTD,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喀布尔女孩

作 者: [美] 盖尔·雷蒙

译 者: 何雨珈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丁丽丹 刘诗哲

策划编辑: 孙淑慧

特约编辑: 尹艳霞

版权支持: 李彩萍

装帧设计: 李 洁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150 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5017-5

定 价: 28.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喀布尔女孩 
The Dressmaker of Khair Khana

献给所有永远默默无闻的女性
献给罗达·塔兹马赫和弗朗西斯·斯毕曼

作者的话

本书中描写的故事，都基于在喀布尔、伦敦及华盛顿特区长达三年的实地采访和调查。在这三年中，阿富汗的局势不断恶化。因此，出于维护人身安全和保护个人隐私的考虑，书中的很多人物，我都使用了化名。同时，应相关人物的要求，我也对某些对本书内容不太重要但有可能泄露人物真实身份的细节进行了一定的删减。对于时间和日期的准确性，我做了大量的校对工作，尽量使其与史实相符。鉴于过去三十年和这个故事开始以来，阿富汗经历了多次巨变，我不得不承认，时间和日期的准确性还有待进一步商榷。

前言

初识阿富汗，是在2005年冬天一个寒冷的早晨。当时，我连续两天马不停蹄地借道伦敦从波士顿赶往迪拜。旅途的劳顿令我头晕眼花，但内心的焦急却让我顾不上休息。在迪拜机场2号航站楼，一夜没合眼的我终于等来了阿富汗航空公司飞往喀布尔的航班。该航班定于清晨六点半出发，按照阿富汗航空的要求，乘客提前三个小时就得到机场候机，因此我也没费心找落脚的旅馆。机场巨大的信息牌上闪烁着黎明前起飞航班的目的地，看上去就好像世界各个“传说中”热点地区的大集合：卡拉奇、巴格达、坎大哈、罗安达^①。很快，我就意识到自己是这空旷的机场大厅里唯一的一名女性，于是尽量低调，不引人注目，只是在一个角落的窗台上靠着，等着手机充好电。尽管如此，我还是能感

① 卡拉奇为巴基斯坦港口城市，巴格达为伊拉克首都，坎大哈为阿富汗城市，罗安达为安哥拉首都。

——译者注（后文注解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觉到周围男人投来疑惑的目光。他们在我身边来来往往，大都穿着宽松的长袍，推着租用的银色行李车，里面堆着鼓鼓囊囊的手提箱，用粗大的棕色绳子绑在一起。我想他们一定在心里嘀咕：这个年轻女人凌晨三点孤身一人待在这里，到底做什么呢？

说实话，我自己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身上还穿着从波士顿出发时的一身行头：灰色高领毛衣，卡斯尔牌牛仔裤，以及一双英伦棕色皮靴。这显然十分扎眼。于是我偷偷摸摸地溜进空空如也但干净整洁的女卫生间，换上一条宽松肥大的黑裤子，一件黑色长袖T恤，再加一双黑色袜子和黑色的埃罗索斯牌女鞋。全身黑衣中唯一的点缀是一件从马萨诸塞州剑桥镇买到的铁锈色宽松毛衣。除了这些行头之外，还有朋友阿丽亚借给我的一条黑色羊毛头巾，现在我正努力戴上这条头巾并进行调整，使这副打扮看起来尽量随意些。现在想来，仿佛就在刚才，我还身处阿丽亚位于哈佛商学院的宿舍中，两人一同坐在舒适的沙发里，她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戴这条头巾。然而，现在那地方离我已经是十万八千里，冰火两重天了。仅仅二十五个小时后，我们之间，就分处在不同的世界。我站在这冷冷清清的卫生间里，犹犹豫豫地将披巾穿穿脱脱，直到看起来勉强符合“规范”。“哦，没问题的！”看着镜中的自己一脸的犹豫，我不由自主地大声说道，“这将是一次很棒的旅行。”我踏着那双样式保守的高跟鞋，故作镇定和

自信地走出了卫生间。

八个小时以后，我到达了喀布尔国际机场，走过一段金属台阶，来到临时铺就的沥青路面上。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冬日的干爽空气混杂着浓烈的烟尘味道扑鼻而来。我笨手笨脚地往前走着，一边拖着橘色的箱子，一边努力使阿丽亚送的羊毛头巾不滑落下来。每走几步我就得停下来调整一下我的面纱。以前从来没人告诉过我，我也没做好心理准备，原来在走动中要保持戴好头巾是这么难，更别说还拉着一大堆笨重的行李了。我周围这些女人怎么能做得这么优雅从容呢？我也尽量想做到像她们一样，但却事与愿违，看起来滑稽可笑，仿佛一只外来的丑小鸭，不小心闯入了美丽天鹅的领地。

我在这保持着20世纪60年代风格的机场待了一个小时。尽管苏联已经撤离阿富汗好几十年了，跑道两旁仍然有俄国坦克的残躯，我看着这样的景象，仿佛自己也置身于那个时代。接着，我成功地通过了护照检查，没出什么岔子。“目前还不错。”我暗暗地想。然而，一过海关，我周围的每个人就迅速地从各个方向匆匆前行，他们都有事情，都有目的，我却茫然无措，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该往哪里去。焦躁的情绪好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刺穿了我的身体。一般来说，记者们去到遥远和危险的地方，总会寻找一位当地的男向导或女向导，安排他们的行程、采访以及

住宿等。我的向导是个叫做穆罕默德的年轻人，现在连影儿都没有。我在自己的包里拼命寻找他的电话号码，心中无助又害怕，表面上却装得冷静从容。他去哪里了呢？我不禁思索。他是否已经忘记，自己曾经在电子邮件中答应来机场迎接一个美国人，原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新闻制作人了呢？

终于，我在手包最深处找到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他的手机号码。但我还是没法联络他，手机的电量是充足的，但是伦敦的SIM卡在喀布尔却没法用。除此之外，我没准备任何通讯工具。

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穆罕默德还是没有出现。我甚至想象自己可能五天后还滞留在喀布尔机场。我身边走过一家阿富汗居民，他们高兴地穿过玻璃门，我突然感到自己比之前凌晨三点待在迪拜机场2号航站楼时更为孤独。此刻，唯一给我带来安慰的竟是机场门前巨大的北约军用坦克周围巡逻的英国士兵，即使他们脸上没有一点笑容。我想：就算最坏的事情发生，我还可以去求助那些英国人，让他们收留我。过去，我还从来没有觉得一辆坦克能让我安心呢。

终于，我将目标锁定在一个二十出头、胡子拉碴的年轻人身上，他在机场前门的一个小角落贩卖电话卡、蜡烛以及饮料。我一脸笑容地递给他一张五美元的钞票，用英语询问自己是否能借

用一下他的手机。他笑了一下，把手机递给了我。

“穆罕默德，”接通电话之后，我大声喊着，确信电话那头的人能听到。“你好，你好，我是盖尔，那个美国记者。我在机场，你在哪儿？”

“盖尔，你好。”他平静地说，“我在停车场，已经待了两个多小时了。因为安保措施的关系，我不能更接近你了。跟着人流走吧，我就在这里等你。”

当然啦，安保措施。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我推着堆得满满当当的行李车来到有两个橄榄球场那么长的停车场，这里已经离那些北约坦克和英国士兵有好几英里的距离了。我终于看到如约前来的穆罕默德，他脸上挂着温暖的微笑。

“欢迎来到喀布尔。”他说，接过我的艾迪·鲍尔牌大包，里面塞满了我特地为此行购买的东西：小型照明灯，长衣长裤以及羊毛毯子。我在想，穆罕默德不知道用这种方式迎接过多少天真的不明情况的外国人。他多年以来都和外国记者合作，自己的本职也是一个记者。一个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台工作的朋友向我强烈推荐他，因为他很专业，经验丰富，并且值得信赖。这些品质绝对是我在这趟2005年冬天的喀布尔之旅所不可或缺的。因为之前偶尔为之的导弹袭击和爆炸事件正在逐渐升级为以狂轰滥炸为代表的战争动乱。我对朋友的推荐充满了前所未

有的感激。

堂堂的阿富汗首都，街道却毫无秩序，混乱不堪。没有任何交通标志，只有不甚专业的警察勉强维持，因此，拄着拐杖的残障人士，破破烂烂的汽车，嗷嗷直叫的驴子，电动自行车，联合国派来的SUV，都在路上一股脑儿挤着，试图找到前进的路。喀布尔浑浊空气中的污垢附着在每一样东西上面：人的心肺、毛衣、头巾以及车窗。这就是持续数十年的战争奉上的恶心纪念，每一样维持环境卫生的东西，小到一棵树木，大到排污系统，全都被战火毁得几乎不留任何痕迹。

我从来没见过哪一个市区能有和西部乡村一样的景象。我们开的是一辆蓝色丰田花冠轿车，经常会有司机突然将车头掉转到离我们不过两英寸的地方，又更加猛烈地开回自己的车道。交通拥堵严重，我们和各式各样的丰田、宏达和奔驰车一起，龟速前进。阿富汗本地音乐从那些车中飘出。烦躁刺耳的喇叭声响彻了整个城市。白发苍苍的老者肩披毛毯，走到汽车前面，对驶来的汽车视若无睹，让交通状况更加糟糕。很明显，他们，以及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对这样的情况习以为常，这就是喀布尔，处处都是疯狂，处处都是混乱。

我却无法习以为常，我还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景。

这是我在哈佛商学院攻读MBA第二年的寒假。新闻一直是我

的最爱。但一年前，在美国广播公司政治新闻板块工作多年，主要报道总统竞选情况的我辞去了那份工作。而立之年，我想要来一次人生的跨越，决定追随我对国际动态的激情。我很确信如果不赶快辞去工作，可能会一直安于现状，在那个位置上干一辈子了。因此，我走出了华盛顿特区这片熟悉的天地，继续求学。辞职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寻找一个没人报道过的素材丰富的专题，寻找让世界为之震撼的故事。

激发我热情的专题是在战地工作的女性。她们是一群特别英勇无畏的企业家和创业者，她们的故事能给人无限的灵感与激励。她们在世界最为危险的冲突中努力求生，并且尽全力克服冲突带来的后遗症。

卢旺达是我寻找这些故事的第一站。在那里，我获得了很多第一手资料，亲眼见证了女性为自己和他人创造商机，在国家重建中尽一份力量。在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灭绝之后，女性数量立刻占到卢旺达居民的四分之三。十年后，她们仍然是多数人口。首都基加利的国际官员（他们都是男人）告诉我，那里没什么故事可以挖掘，卢旺达的女性没有一个是小业主，她们做的都是一些收入微薄的小生意，比如在路旁的小摊上贩卖水果或者手工艺品。我搜集到的资料却告诉我，这些官员大错特错了。我采访到的女性，有的拥有加油站，有的经营着旅馆。我采访到的那些水



果商贩，每周都有两次会从欧洲进口鳄梨和香蕉。不久，我就在《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报道，介绍了一些我遇见的最为成功的女企业家，其中一个还把她的篮子卖到了纽约著名的连锁超市——梅西百货。

现在，就是短短几个月之后，我来到了喀布尔，还是为《金融时报》写特稿，来报道一个令全世界震惊的现象：在塔利班的占领下，阿富汗正崛起着新一代的女商人。同时，我也答应了哈佛商学院，要寻找到一位主人公，把她的故事作为一个案例，写入下一年哈佛商学院的教程。之前和我一起的新闻战线奋斗过的同事在我为喀布尔之行做准备时给予了很多帮助，纷纷介绍他们认识的相关人物，为我铺路。但就在我真正到达这里的那一刻，才意识到我对这个国家知之甚少。

我拥有的全部，不过是找到一个好故事的强烈渴望。

大多数关于战争及其后遗症的故事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男人做主角：战士、退伍的老兵、身处其中的政治家等。而我想知道的却是战争施加了什么东西给那些被遗忘的人：那些即使自己的世界支离破碎，也勇敢生存下来的女性。战争改变了女性的生活，并且常常在她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强迫她们充当了谋生者的角色。为了家庭的生计，她们不得不另辟蹊径，为孩子和亲人们提供活路。但她们的故事很少公之于世。我们往往更习惯和

理所当然地将女性看做战争的牺牲品，供我们同情和歆歆。从未想过她们也是能屈能伸的生存能手，值得我们尊敬和叹服。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

就这样我来到了喀布尔，寻找心中的故事。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政府联合阿富汗军人力量，驱逐了塔利班政权，那之后阿富汗妇女的困境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我很想看看，这个在四年前女性被禁止上学和工作的国家，她们都开办了什么样的公司。在这之前，我曾历时数周，与电视主播、报刊记者、哈佛的朋友以及阿富汗的义工交谈，积累了很多材料，工工整整地装订成四页密密麻麻的资料，其中包括了可能成为故事主人公的人物的名字，以及可能的电邮地址。这份资料，我从波士顿就一直随身携带，现在也在我身上。

我和穆罕默德讨论了我的采访思路。我们来到一个记者常常下榻的旅馆，在其空荡荡的餐厅里坐下来喝茶。我问穆罕默德是否认识独立经商的女性。他笑起来：“你知道的，在阿富汗，男人不插手女人的活儿。”但他又略略想了一会儿，抬起头来，点头承认说，他听说过喀布尔的一些女性，开办了自己的公司。我希望他说的是实话。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我按照自己的花名册一步步追踪潜在的受访者，但却一无所获。名单上的很多妇女管理的机构都是非

政府组织，也就是NGO，根本算不得生意。事实上，我曾经在2002年国际社会进入阿富汗时听说过，注册一个NGO比注册一个公司容易多了。其实很久以前，创业的激励机制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华盛顿和喀布尔的美国官员一直在奖励阿富汗的女商人们，以她们的名义举办公共活动，捐献上百万美元的政府基金。但现在，我却为了找到一个有明确商业计划的女企业家而苦苦摸索。她们一定是存在的，也许我没找对地方？

截稿日期一天天临近，我开始害怕自己也许会一无所获地回到美国，让《金融时报》和我哈佛的教授大失所望。终于，一位在纽约非营利机构“Bpeace”工作的妇女给了我一个名字：卡拉·赛迪奇。这个年轻女子从一个女裁缝成长为一名拥有连锁生意的企业家。朋友告诉我，她不仅仅经营着自己的公司，而且还是在塔利班统治时期，自己还只有十几岁的时候，开始起家的；她一开始并没有想过自己能走到这一步。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令我激动的素材。一种令新闻记者热血沸腾的兴奋和冲动传遍了我的全身。想想看，一名传统女性，为了全家的生计，在塔利班的眼皮底下，开创了自己的生意，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和大多数外国人一样，在我的想象中，塔利班统治时期，阿富汗的妇女都是沉默和被动的，仿佛囚徒一般等待着别国的救援。这个故事让我深深着迷，热切地渴望着做进一

步的挖掘。

随着了解不断深入，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卡米拉不过是在塔利班统治时期仍然勤奋工作的众多年轻女子中的一员。当战火和混乱的管理令喀布尔的经济陷入瘫痪，她们为了维持家计而走上了工作的道路。起步的生意都是微小的，最后却变成巨大的商机，并让她们在各种各样的规矩和限制中找到了新的道路。和全世界的妇女一样，她们勇往直前的最初动力都是自己的家庭。在严苛的系统之下，她们学会了如何生存，甚至学会了如何成功。

有些女性在外国驻阿富汗的NGO工作，这些机构通常都致力于妇女健康。塔利班当时准许这些机构继续在阿富汗运行。女医生也可以继续工作。同样的还有那些帮助其他妇女学习基础卫生常识和护理知识的女性。有些女性则在地下学校当老师，向不同年龄的女性讲授各种各样的知识，从微软Windows到数学，从达里语到《古兰经》。这些课程遍布喀布尔，上课地点一般在某个成员的家里，或者女子医院里，那是得到塔利班允许的唯一安全地带。但女性们永远无法完全放松警惕，常常在上课途中，就会有人冲进课堂警告说塔利班要来了，于是那堂课就此中断。其他女性，如卡米拉，开办了家庭作坊，并且冒着生命危险寻找产品的买主。尽管散布在各行各业，这些女性都有一个共同点：她们

工作意味着家人可以生存下来，不用挨饿受冻。而且，她们都是自力更生，没有任何帮助。

没有任何人真正讲述过这些伟大女性的故事。曾有过一些战时的日记，透露了塔利班对女性的残暴统治以及她们的绝望处境；也有励志的书籍，讲述了塔利班撤军后女性寻找新生的故事。但这个故事是完全不同的：这是关于阿富汗女性在被外面的世界遗忘之时，如何互相支持和鼓励的故事。她们的国家贫穷而残破，没有一点外界的支援，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们挺身而出，积极自助，负担起家庭和社区的重责。在这个过程中，她们也改变了自己的未来。

卡米拉是这些年轻女性中的一分子。如果要从她的工作对如今阿富汗的持续影响上来判断，不得不说她是最拥有远见卓识的人之一。在塔利班的士兵从喀布尔撤军，不再遍布大街小巷之后的将近十年，我们仍然不断地向这个国家派驻军队，除此之外，对其国情知之甚少；而她的故事会让我们对阿富汗有更多了解。同时，也在我们对阿富汗拭目以待，讨论最近十年来缓慢的进步是否能为阿富汗妇女提供新的契机，还是妇女的生存环境改善会昙花一现，在外国军队和组织离开之后也跟着分崩离析的时候，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引导。

下决心写出卡米拉的故事是件容易的事。但真正开始着手就